

## “学一代”与“学二代”的发展反思

主持人 康永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教授]:在社会学理论视野中,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中的子代通常具有一定的文化优势,他们的受教育过程更加顺遂。布尔迪厄认为,那些具有文化优势的个体,在学校生活中可以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任性”,用于摆脱外在环境在自己身上施加的学业压力。而那些试图借助教育实现向上发展的群体,一方面认同社会中的文化优势,另一方面受限于当前自身境况,易被自己向他人展示的外表和他人对自身的评价所困扰。他们由于担心做得不够,只能加倍努力。

本专题刊发的两篇文章《文化生产还是文化再生产?——“学一代”与“学二代”的教育冲突与反思》与《光环下的另一面:“学二代”的家庭图景与成长困境》基于社会发展变革,关注“学一代”发展和“学二代”成长之间的代际差异。文中的“学一代”可以看成通过读书实现自我发展的群体,大致介于布尔迪厄上面所说的两类人群之间。由于“学一代”的家庭本身还在向上发展过程中,他们依然面临一定的压力。但他们的子女成长于一个相对优越的物质与文化环境,因而对“学一代”的教育焦虑可能产生某种抵制。如何理解上述代际间的教育差异,两篇论文中的一篇在家庭层面强调了光环下的另一面,关注“学二代”家庭的内在局限,另一篇则在教育结构层面揭示了文化生成与文化再生产的对峙。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4.01.015

### 文化生产还是文化再生产?

#### ——“学一代”与“学二代”的教育冲突与反思

康永久 刘玮莹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首都师范大学 初等教育学院,北京 100048)

**【摘要】**本研究以10位“学一代”及其部分“学二代”子女为研究对象,借助深度访谈和自传社会学方法,探究代际流动中的“学一代”发展历程及其对下一代教养实践的影响。研究发现,“学一代”在个人发展历程中形成了

收稿日期:2023-11-10

作者简介:康永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教育基本理论与教育社会学;  
刘玮莹(通讯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教育社会学、课程与教学论及基础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社科一般项目“‘双减’政策下北京市家庭培育模式转变与儿童成长机制研究”(课题编号:SM202310028012)、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一流学科培优项目“城市化进程中儿童青少年的成长陷阱与教育改进研究”(课题编号:YLXKPY-ZYSB2022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吃过苦”、恢复高考及社会地位变迁的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影响了其对“学二代”的教养实践,具体体现在对“学二代”的吃苦式培育、重视教育及精心规划学业等方面。但在“学一代”对“学二代”的教养实践中,存在一种代际间的反差,造成文化生产与文化再生产的对峙。研究认为,代际流动具有双向性,“学一代”应进一步反思“学二代”的自身情况和需求,助力“学二代”全面发展。

【关键词】“学一代” “学二代” 文化生产 文化再生产 代际流动

##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梳理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个体生命历程通常是时间和社会事件的交织。人们在经历公共社会事件或者面临特殊情境时,会留下集体记忆和相似的文化体悟。不同时代的集体记忆,塑造了特定时代人们的文化体悟,形成不同“代”的集合。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要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当中,去体会各种事实的特殊涵义,而社会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提示着这些事实对之具有的意义和产生的影响”<sup>[1]</sup>。本研究试图在个体生命历程和社会事件交织的背景下,探讨“学一代”自身的成长模式及其与“学二代”成长模式的关联,分析代际流动的内在机制。

代际之间的地位传递也称为代际流动(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即父辈和子女间在社会地位上的传承与变化<sup>[2]</sup>。因为它涉及父辈社会结构的形成方式以及其在多大程度上传递到下一代等相关问题,也有研究者将“代际流动模式”称为“家庭地位继承模式”,强调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影响<sup>[3]</sup>。代际流动受父母经济水平和职业、地区、教育方式、家庭模式等因素的影响<sup>[4]</sup>,能够反映家庭养育过程中父母与孩子的代际交互模式。在代际流动过程中,存在以经济、地位、文化为不同载体或相互组合的传递方式<sup>[5]</sup>。

美国社会学家高芬·安纳特(Gofen Anat)指出,“学一代”(First-generation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是父母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是家庭中首先进入大学的群体<sup>[6]</sup>。在社会转型和发展时期我国出现的“学一代”,与高考制度有一定的关系。1977年恢复高考后,很多农家子弟也因此燃起考大学的希望<sup>[7]</sup>。在这一过程中,从乡土中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在城市中不断发展自我,成为在家族乃至乡土中的“学一代”,最终实现社会流动。如今这批“学一代”已成为城市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如教师、医生、公务员、银行职员、技术人才等。作为城市新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在改革开放、就业分配、独生子女政策等社会公共事件中建构自己的集体记忆。对“学二代”成长的特别关注,也已成为他们的社会性格。

“学二代”作为我国新生代的代表群体之一,不仅在经济高速增长、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时代背景下成长发展,也是互联网背景下成长的一代。信息化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使他们具有了更开阔的视野、更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更多元的价值取向<sup>[8]</sup>。“学二代”成长过程的

特殊性反映出父代与子代之间通过受教育程度实现的代际流动<sup>[9]</sup>。相比于“学一代”艰苦匮乏的教育环境,“学二代”更容易获得父母创造的教育资源,他们的教育和文化资源因而较为丰富。

本研究试图通过深入分析“学一代”的生命历程及其对“学二代”的教养实践,厘清社会转型、个体发展及代际传递之间的文化机理与脉络,剖析在我国快速发展过程中,由文化变迁带来的两代人在知识获得、教育理解和个人成长方面的差异。“学一代”和“学二代”之间的代际传递,可以视为社会转型的一个侧影,有助于透视宏大历史叙事背景下代际流动中的二律背反,增强我们对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教育期望与自我寻觅等问题的理解。

## 二、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深度访谈与自传社会学方法,以10位“学一代”的生命叙事为研究主线,同时将“学二代”成长的隐性线索穿插其间。其中“学一代”的年龄介于50-60岁之间,其参加高考的时间介于1980-1989年之间,其中有3人参加过不止一次高考。“学一代”中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有5位,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有3位,本科学历的有2位。其职业包括大学老师(4位)、编辑(1位)、医生(1位)、国企职员(2位)、公务员(2位),他们子女的年龄介于20-30岁之间,具体信息见表1(其编码采用子代化名+父母称谓+工作性质方式呈现,如小晨-母-高校教师)。

表1 “学一代”相关信息

“学一代”	出生年份	现居地 (省份或城市)	参加高考年份	曾就读大学	学历	职业	联系途径
小晨-母亲	1962	北京	1982	北京某大学	博士研究生	高校教师	电话
小庆-父亲	1970	北京	1989	北京某大学	本科	公务员	面对面
小夏-父亲	1962	武汉	1980	湖北某大学	硕士研究生	国企职员	电话
浩然-母亲	1968	北京	1988	北京某大学	硕士研究生	高校教师	电话
张丽-父亲	1964	北京	1983	北京某大学	博士研究生	高校教师	面对面
小刚-母亲	1965	重庆	1983	四川某大学	硕士研究生	国企职员	面对面
刘可-父亲	1964	山西	1984	山西某大学	博士研究生	大学教授+医生	电话
凡凡-父亲	1971	洛阳	1989	郑州某大学	博士研究生	高校教师	电话
小梦-母亲	1964	兰州	1981	兰州某大学	博士研究生	编辑	面对面
亮亮-父亲	1963	北京	1982	北京某大学	本科	公务员	电话

本研究对“学一代”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个人传记方法,同时也对“学二代”进行访谈作为研究的互证和呼应。深度访谈作为定性研究中的方法,不仅需要关系的嵌入,也需要关注访谈背后的叙述意义<sup>[10]</sup>。而自传社会学方法更加关注被研究者自身的文化逻辑,从个体视角

剖析其成长和发展轨迹<sup>[11]</sup>。“学一代”在叙事中提到的社会公共事件将成为划分其发展阶段的关键节点,如恢复高考制度、改革开放的推进、毕业分配政策的推行和取消等,这些也是“学一代”集体记忆的时代特征。具体访谈信息如表2所示。

表2 “学一代”半结构式访谈大纲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成长与求学经历	成长背景	家庭情况、家庭人口、父母职业、生活方式、家庭类型
	集体记忆	恢复高考政策、改革开放、统招统分、独生子女政策
	求学经历	上学历程、考大学、父母角色、教师评价、对高考的看法
生活与工作状态	融入城市	城市生活的适应、居住环境、个人感受、城乡生活对比
	工作状态	工作类型、收入水平、工作特点、上升途径
	未来期望	生活方面、工作方面、孩子方面
子女教养方式	家庭模式	家庭类型、相处模式、亲子关系、冲突矛盾、日常生活
	教育方法	知识传递、经验分享、环境营造、日程规划
	教育投入	学校、学区房、课外补习、出国游学、娱乐方式
教育期望	学业成就与未来	教育水平、视野、就业、工作类型、孩子个人成长

在本研究中,“学一代”自身的经历以及对“学二代”的教养过程以一种清晰的逻辑框架被呈现出来。某种程度而言,“学一代”自身的叙述正在建构一套独特的理论视角,从中可以发现历史时间线上的偶然性、公共性以及自我发展中的自主性。农家子弟如何成为“学一代”,又如何教养“学二代”,在起承转合的生命叙事中逐渐显现出来。

### 三、研究发现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世代文化特征的碰撞,既形成了相互的交织与重合,又由于各自的世代特征而具有外延性的差异和变化<sup>[12]</sup>。在此过程中往往出现传统与现代的冲撞、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东西方教育理念的冲突与更新<sup>[13]</sup>。“学一代”和“学二代”亦是如此,一系列代际文化、教育理念及生活习惯的差异乃至对立由此出现。

#### (一)“学一代”的生命历程与集体记忆

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恢复高考、毕业分配、城乡融合政策等将“学一代”带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他们由此经历了与祖辈不同的人生道路,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痕迹和群体特征<sup>[14]</sup>,也构建了一种特定历史脉络中独特的文化生产。

##### 1. “吃过苦”的文化底色

在我国,人们通常用“过日子”描述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sup>[15]</sup>。“吃苦”是出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一代”自叙中的高频词。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许多农村家庭来说,物质资源的匮乏使得他们想要供养孩子读书并不容易,农村家庭中“谁能读书”“要不要继续读书”在

个体进入事务性劳动之前就可能需要仔细考量。小刚母亲回忆曾经的求学经历时,提到了读书与生计之间的艰难抉择:

我父母是农民,两个姐姐很早就不能念书了。那年我正好赶上统一高考,我当时纠结要不要去,村支书跑来说服我父母,说我适合读书。后来我上了省里的重点大学,成了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访-小刚母-国企职员)

“学一代”获得读书机会是外部机制、偶然性及自我文化生产的共同结果。“学一代”成为了乡土中“不走寻常路”的一群人。曾经那些“吃过苦”的日子是他们生命中的文化底色,这些在个体适应城市生活中与城市文化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学一代”特有的生活模式。

## 2. “恢复高考”:命运的转折点

恢复高考后,国内迅速形成一股规模空前的“大复习”“大学习”热潮<sup>[16]</sup>。自此,农村青年想要进入城市改善生活境遇,高考成为途径之一<sup>[17]</sup>。小夏的父亲说道:

我特别感谢恢复高考政策,也很感激父母供我读书。考大学是我第一次到城市。所以,上大学的那一刻,我就决心要留在这里。以后为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访-小夏父-国企职员)

对于从农村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上大学意味着人生际遇的新开始。这些七八十年代的“学一代”借此找到了农业劳动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通过教育实现了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这不仅仅是个人境遇的改变,而且他们带领整个家庭实现了社会流动,同时也在努力为下一代创造相对稳定且更具优势的教育条件和物质文化生活。

与此同时,“恢复高考”也唤起很多“学一代”的自我认同与个体意识,形成勾连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重要纽带<sup>[18]</sup>。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认为,“教育成为社会流动的阶梯,甚至是达到社会平等的重要手段”<sup>[19]</sup>。“学一代”也因此表现出学校化的心性品质<sup>[20]</sup>,他们尊崇知识、敬重教师及依赖学校。他们借助教育确认自我的价值,也希望通过教育推动下一代的发展。

## 3. 社会地位变迁中的稳中求进

在“学一代”的集体记忆中,另一项重要的社会公共节点是统招统分政策<sup>[21]</sup>。很多七八十年代的“学一代”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工作,获得了“铁饭碗”,成为城市中的新中产阶级代表。因此,与土生土长的城市中产阶级相较而言,“学一代”身上突出体现着一种上下通达的流动特质。他们在城乡社会之间不断尝试、摸索、奋进、往复,从而建构一种城乡融通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使“稳定向上”成了“学一代”生活的内在倾向。刘可的父亲这样梳理自己事业发展的脉络:

那时候我们大学毕业就能留校,因为工作表现比较好,很早就被提拔。我在1989年大学毕业,1994年就成了教研室主任,1998年就开始当学院的系主任,后来做了院长,一直到2016年底12月才换届。(访-刘可父-大学教授+医生)

可以看出,“稳定向上”代表着“学一代”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的自洽状态,也表明他们的美好生活憧憬具备可能性。傅高义在描述新中产阶级时提到:“稳定的工作环境和科层体制中的上升途径,使得他们能够在获得安稳工资的同时也大致准确地预期在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的

位置和薪水,甚至准确地预见自己上升的路径和年限”<sup>[22]</sup>。相对于商人、店主、个体户等来说,“学一代”群体更能够把工作和休息区分得泾渭分明,将分配给家人和自己的时间进行合理规划<sup>[23]</sup>。城市中的工作提供了稳定的工资、福利以及社会保障,从中也能够看见一条有迹可循的发展途径<sup>[24]</sup>。“学一代”通过脚踏实地、亦步亦趋的方式寻求发展,这影响着其对“学二代”的养育模式。

## (二)对于“学二代”的教养实践

“学一代”和“学二代”虽然在城市中以家庭为单位共同生活,但相比于“学一代”的“半乡土半城市化”文化情境,“学二代”是完全的“城市化”产儿。现代文化媒介的更新带动了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年轻一代在城市中更容易以信息为媒介,也在快速传播和接受信息的过程中建构自己的社会网络关系。在“学二代”家庭中两代人的记忆和文化特质在同一时空的相遇,既存在着代际间的相互影响,又存在教养实践的差异<sup>[25]</sup>。

### 1. “吃苦式”培育

对于吃过苦的“学一代”而言,在融入城市时,乡土记忆变成了其在城市社会中扎根和茁壮成长的“养分”。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认为,“在人们的感受上,记忆现象难免是支离破碎的,利用它们甚至无法复原‘历史原形’,但它可以提供一个‘苦难的宝藏’,用以衡量集体意识中的遗忘和压抑的现实状况”<sup>[26]</sup>。那些求学过程中的艰辛以及风雨飘摇的历程,常常在“学一代”与“学二代”的对话中被不断提及,或者已转化为一种鞭策,成为“学二代”教养模式中特殊的文化样态,承载着道德教化功能。凡凡就曾提到:

父亲常给我讲起他们多不容易,他在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后来又远赴日本学习,在日本完成了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才回国。我在父亲身上看到一种很强大的毅力,我挺敬佩他们那一代人。(访-凡凡-博士-在读)

在“学一代”的家庭教养中,“吃苦”成了具有说服力的教材,甚至成了“学一代”家庭文化资源的“内核”。父母以道德教养引导子代意识到当下生活的来之不易,教导他们对未来生活保持慎思和奋进。在这样一种家庭结构中,乡土与城市、艰苦与舒适、传统与现代等生活情境交织,使得两代人的生活情境和生命历程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共振。在这里,“吃苦”被“学一代”表征为两层含义:一是对比式教育,即将曾经艰苦的生活条件与孩子现在的城市生活对比,借以传达一种家庭代际文化的机理,从而以“苦难”文化唤起子代对现代生活的反思,使他们产生对生活的审慎和紧迫感;另一种是规避式把关,即对于真正的苦难,“学一代”实际并不希望子代经历,反而通过帮助、庇护、规划等方式竭尽全力满足子代在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但要求其在学习上彰显踏实吃苦的精神。

### 2. 对教育的重视与关注

正是经历了高考的转折点,“学一代”看到教育具有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由此,“学一代”对于教育具有一种强烈的执念。在教育子代的过程中,他们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书香底色的家庭教育环境,提供一套殷实和充沛的教育资源。可以说,“学一代”家庭既有“耕读人家”的底色,又有对“诗书传家”的向往。因而,“学二代”从出生开始便沁润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中。他们对外在世界的认知,在一种精细、协同的教养模式中展开。在本研究中,浩然母亲分

享了她的教育心得:

孩子小时候,我在书架上放置很多适合他读的书。等到他长高了以后,就在二、三层放置自然类、科普类的读物,在他身高所能拿到的地方,他自己想看就去翻着看。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悄悄感到高兴。(访-浩然母-高校教师)

美国社会学家保罗·福赛尔(Paul Fussell)提到,“由于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期望和不同的心理环境,各个阶层不仅阅读不同的东西,而且作为这种阅读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相信不同的东西”<sup>[27]</sup>。“学一代”试图尽早为孩子打开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使子代对知识世界带有一种诗意和自如。他们以科学规划和理性教养构建一个面面俱到的文化空间,不断挖掘孩子的潜能,还借助旅游、参观博物馆等日常实践帮助孩子扩展眼界。

在“学二代”进入学校教育之后,为了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择校、学区房同样成为“学一代”的选择,学校声望、硬件设施、学生成绩、升学率等信息,则成为择校的“风向标”<sup>[28]</sup>。部分“学一代”甚至为了给“学二代”选择更好的学校,不惜搬到了“老破小”的学区房。可以说,学区房的高房价不仅是商品化的结果,更是优质家庭区域聚集的后果<sup>[29]</sup>。“学一代”试图通过精密教养、全方位参与、系统规划、严格管控,帮助孩子在“才能”选拔中脱颖而出,至少不被落下。

### 3. 精心规划

对“学一代”而言,他们希望在城市中为子代的未来兜一份底,也希望子代能够通过学业获得教育和文凭。他们因此期望通过一套理性规划和精细安排,帮助子代平稳顺遂地走下去,防止他们在发展中被落下。访谈中亮亮父亲提到:

小孩是越长大越不好管。他好像对每件事情都挺感兴趣,但又变得特别快。所以还是要管,像风筝一样用绳子拽着他,要不然飞走了或者摔下来,我真害怕他承担不住。(访-亮亮父-公务员)

尽管“学一代”尽力规划孩子的未来,然而相对于自己“稳定向上”的生活方式,出生在城市中的“学二代”表现出更大的跳跃性和可变性。李春玲指出,“50后”或“60后”在经济落后、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度过他们的青少年时期,而“80后”“90后”乃至“00后”的新生代则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老一代与新生代的代际差异和代际冲突必然十分突出<sup>[30]</sup>。城市空间和广阔视角,给年轻一代更多的可能性。最终,这些孩子身上叠加了不同的色彩,形成一种现代的流动感,包括以兴趣和自我为中心的不断试误<sup>[31]</sup>。

“学二代”相较于父辈,在日常生活琐事的决策中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上,都在回答“我将如何更好地生活”这一问题。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的,“现代性已经逐渐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只在一个场域内求发展和实现自我价值”<sup>[32]</sup>。因此,“学二代”与其父辈的区别在于他们对自身潜力的发掘永无止境。技术革命赋予了他们搜索潜力,在虚拟的场域中随意跨界并享受着成功的喜悦,同时也可能面临试误的迷茫<sup>[33]</sup>。他们脱离安稳的路线,而在现代社会活动中进行反思性建构。只是该成长过程对于身为父母的“学一代”而言,心始终悬在空中,他们不得不精细编制一张兜底之网。

#### 四、结论与讨论

“学一代”与“学二代”通过代际流动串联起来了一条较长的生命线,初步回答了“教育如何长远的影响个体的生命历程和文化观念”这一问题。社会历史事件和关键节点刻画了“学一代”的自我成长纹理,他们又通过教育带来的代际流动,与“学二代”的成长发展产生交叠和互动。在此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过去与未来交织,两种不同的教育结构也在此隐现。乔恩·威特认为,“作为个体的自我与塑造生活的更大社会和历史力量之间,正在呈现着一种关系的意愿和张力”<sup>[34]</sup>。在“学一代”的自我成长与其对“学二代”的教养实践中,我们也能看到一种代际之间的反差及一种文化生产和文化再生产的对峙。

第一,“学一代”“自然成长”中的文化生产。在社会历史语境和集体记忆中,“学一代”的生命历程是通过本身的文化生产建构起来的。他们大多借助学校弥补了乡土中匮乏的文化资源,实现了文化创生。这一生命历程中尽管有外部客观条件的局限及教育资源的制约,但他们通过读书谋求发展,成为“爱拼才会赢”的写照。换言之,“学一代”借助读书实现发展,是一种以文化生产为根基的“自然成长”。在此过程中,父母把学习过程完全交给“学一代”,这反而给予他们“自然成长”的空间。因此,“学一代”的“自然成长”充满着偶然性及随机性与开放性,呈现出自我发展的活力和文化生产的弹性。支撑他们进入知识世界的持久原动力,恰恰就是这样开拓性的内驱力。在源自生活本身的教育过程中,他们的努力、机遇和成功都实实在在地从自己的指尖流出,经历了从无到有、聚少成多的创生过程。

这样一种“自然成长”与前面提到的“吃苦”究竟是什么关系?很显然,“自然成长”正是以“吃苦”为前提。由“吃苦”塑造的前期生活,使“学一代”渴望在时代浪潮中自我实现。对教育的信念感和认同感彰显着这一代人靠自己的努力而非门第和财富改变命运的精神。

第二,代际差异与文化再生产。由于看到了知识、教育和学历的力量,经历了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学一代”更加看重教育在代际流动中的意义。由此产生的显著变化就是由于他们在“自然成长”过程中的摸索和不易,他们希望通过理性引导,使子代获得竞争优势。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要让他们的子代尽早得到庇护。许烺光在论及“祖荫庇护”时说:“父亲所做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对儿子应尽的义务,而是父亲对父子共同的祖先承担的责任”<sup>[35]</sup>。在此,孩子们既感受到父辈的权威,同时又生活在一个更加结构化的“安全阀”里。“学一代”内心深处的责任感加剧了他们对子代学习的关注。他们在此进行的教育传递试图关联一个精神实体,将家族的荣耀推至下一代的延续。这样一种内在的驱动力最终带来一种文化再生产。

相对于“学一代”摸索前行的“自然成长”,“学二代”的成长过程显然是一种系统性、全面性、科学化的“理性教养”。换言之,他们的教育选择很大一部分基于父辈经验。为了确保成功,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和意外,“学一代”用最直接、最安全的方式介入到“学二代”成长的全部过程。首先是“不输在起跑线上”,提早进行心智开发。然后,加大教育投资,努力塑造一种全面均衡、特长突出的新形象。最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为子女提供学业或人生指导,成为“学二代”教育中的筛选器。

第三,代际流动下的教育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学一代”内置的筛选器源于自身成长逻辑的表层经验。在对“学二代”的教养过程中,他们通过不懈的投入推行一种新形式的“吃苦”,即主动钻研与精细规划。因此,他们经常在子女还没有行动之前就提前行动,牵着子女前行。在这样一种教育传递过程中,父代权威与子代成长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阎云翔指出,子代的价值取向与现实行为可能存在取向差异;亲子伦理的价值观虽然得以传承,但在与亲代的关系上,子代觉得自己有权要求父母经济支持,另一方面又要求独立自主、不受干涉<sup>[36]</sup>。这不仅源自亲子关系的现实转变,也涉及文化模式的变化。

受外在社会环境变化影响,在“学一代”与“学二代”个体生命历程的交织中,他们之间的教育和文化观念产生了较大差异。“学二代”一方面继承了“学一代”对知识的纯粹向往和对外在世界的开拓与体认,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某种时代特征:他们更偏向以信息为媒介,在自由宽广的学习空间和全球化背景下,探索发展个性化与满足生命的体验感,同时拥有比父辈更加多元的人生选择。周晓虹指出,“年轻一代对于新兴文化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洞察能力使得他们成为拥有知识权威的掌权者”<sup>[37]</sup>。他们因此不愿再忍受上一辈的约束,而是期望逃脱文化再生产的泥淖,具有一种新的文化创生的愿望。

刘云杉认为:“现在的教育已经进入到龟兔赛跑2.0版本。这种变革是一种从学生个人的努力学习、考取高分,走向了更多因素卷入的变革。多元化的选拔背后不只是学生个人的比拼,还有家庭和家长的努力的比拼”<sup>[38]</sup>。但单纯的拼资源、拼消耗对“学二代”本身而言,已是不堪重负,他们至少尝试形成自己的文化生产之路。面对“学二代”的自我表达以及出现在“学二代”身上的各种具身效应,“学一代”也不得不进行教育反思。

从“学一代”向“学二代”的代际流动中,可以看到两条截然不同的“成才”道路。“学一代”的自我成长更接近一种自身即善的过程,一种在自我突破中找寻出路、重建自我的过程。而对“学二代”而言,这一过程则表现为一种理性规划和精细培养,同时伴随更为直接的代际冲突。两种不同的成才模式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代际流动过程中究竟哪些文化在传递?哪些文化在并行、创新和反哺?教育者应该如何看待外在人为的“成全”和“规划”?个体的自我建构和文化创生是否能形塑不同的景观?当代际文化正在从单向传递走向双向流动,只有充分关注到其中的要义,这种由社会发展和代际文化交流所带来的教育差异,才更有可能走向共存、理解和新的创生。

## [ 参 考 文 献 ]

- [1]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 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94页。
- [2] Svallfors, S.. Analyzing Inequality: Life Chances and Social Mobil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66.
- [3] 李煜:《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载《社会》,2009年第6期。
- [4] Zhong, D., Treiman, D. J..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7, (2).
- [5]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版,第26页。
- [6] Gofen, A.. Family Capital: How First Generation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Break the Intergenerational Cycle, Discussion Pa-

per, 2007, (1).

- [7] 钟秉林 王新风:《我国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变迁与理性选择——基于40年高考招生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载《教育研究》,2017年第10期。
- [8] 李春玲:《代际社会学:理解中国新生代价值观念和行爲模式的独特视角》,载《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11期。
- [9] 李晓飞:《从“凤凰男”到“学二代”:高等代际教育传递的城乡差异及其演变》,载《现代大学教育》,2019年第1期。
- [10] 杨善华 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中的深度访谈》,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 [11] 杨善华:《在田野调查中做“有心人”》,载《读书》,2017年第4期。
- [12][14] 风笑天:《社会变迁背景中的青年问题与青年研究》,载《中州学刊》,2013年第1期。
- [13] 周晓虹:《理论的邂逅——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路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版,第32-34页。
- [15] 吴 飞:《论“过日子”》,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 [16] 张乐天:《恢复高考的意义诠释》,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 [17] 陈彬彬:《学业分类过程及其组织制度基础——高考升学率统摄下应试体制的微观运行机制》,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年第2期。
- [18] 王 润:《“记忆的微光”:“恢复高考”的自传式书写与新媒介记忆研究》,载《新闻记者》,2019年第9期。
- [19] 兰德尔·柯林斯:《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刘 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版,第7页。
- [20] 程 猛:《“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述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版,第23-27页。
- [21] 黄晓星 林 滨:《社会变迁与生活机会:1977年以来的生命历程研究》,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 [22] 傅高义:《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周晓虹 周海燕 吕 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版,第28页。
- [23] 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张 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版,第3页。
- [24]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版,第255页。
- [25] 刘祎莹:《文化折叠:中国“学二代”家庭代际文化的传递与冲突》,载《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 [26] 刘亚秋:《记忆的微光的社会学分析——兼评阿莱达·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载《社会发展研究》,2017年第4期。
- [27] 保罗·福赛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梁丽真 乐 涛 等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版,第197页。
- [28] 黄 斌 云如先 范 雯:《名校及其分校质量对学区房的溢价效应:声望效应与升学效应》,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9年第4期。
- [29] 聂 晨:《“学区房热”探析——文化资本视角下对学区房购买动机的研究》,载《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 [30] 李春玲:《代际认同与代内分化:当代中国青年的多样性》,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2期。
- [31]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的流动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版,第1-3页。
- [32]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救与社会》,赵旭东 方 文 王铭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版,第8页。
- [33] 刘祎莹:《中产阶级子弟在精英大学中的生存图式——基于文化资本、场域、惯习的民族志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2期。
- [34] 乔恩·威特:《社会学邀请》,林聚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版,第49页。
- [35] 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01版,第241页。
- [36]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版,第7-8页。
- [37] 周晓虹:《文化反哺与器物文明的代际传承》,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 [38] 刘云杉:《现在的教育,已经进入了“龟兔赛跑2.0版”》,载《家教世界》,2020年第1期。

(责任编辑:刘 彦)